

# 身挡高铁,对规则毫无敬畏之心



本报评论员  
高路

女子一时的得逞与警方一时的妥协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并不值得提倡,而事后该承担的责任依然要承担。



合肥一女子,为了让迟到的丈夫赶上高铁,不惜身挡高铁,执法人员来了也不顾,最后还要无赖躺在地上不起来。

女子的行为震惊了社会,这不仅因为她身挡高铁的举动,让人后怕,还因为她教师的身份,出人意料。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女子所属的学校也作出处理,暂停其合肥市永红路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的职务。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女子却接连犯了好几个错。赶不上火车,自己的问题得自己承担,身挡高铁,威胁公共安全,当然更不对了。对警务人员的执法有异议,也完全可以在事后提出申诉,在现场必须第一时间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女子是老师,还是在学校里有一官半职的人,公共安全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身为老师的当事人已经不能用“我不懂”“我不知道轻重”为借口来搪塞自己的行为了。

女子的行为看起来很罕见,但抛开高铁的场景、女子的身份,其实并不让人陌生。以

自我为中心,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别人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家人能赶上火车,可以牺牲高铁的运转秩序。类似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并不鲜见,比如马路上发生了刮擦事故,不是将车子挪到一边,让出通道,而是直接在马路上争论,哪怕后面的车流已经堵成长龙,也不管不顾,先争赢了再说。其实挪车并不影响事故的处理,但急于逞口舌之快的人显然更多。

更明显的是面对管理人员、警务人员时的态度。这在现实生活中就更常见了。民警来了,当事人不是遵从指令,而是我行我素,习惯于争辩,却不习惯于服从,有理争一争,无理也要搅三分。执法人员的管理得不到第一时间执行,抬高了执法成本,又延缓了问题的解决。当以自我为中心碰到了公共利益为重的南墙,而自以为是的说理又遭遇法律的冷对时,她最后动用了身体这一招。这其实是以自己的身体来逼迫管理人员执法人员作出妥协。

可是用了这么多招,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什么也没解决,相反让原本是很小的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女子一时的得逞与警方一时的妥协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并不值得提倡,而事后该承担的责任依然要承担。

这些行为说到底都是规则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在作怪。女子在高铁上的荒唐行为,因为公之于众后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警方可以继续追责,当事人单位可以作出处理,当事人还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可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又有几个人把它当回事,认真反思一下的。没有平时惯出的这些毛病,也不会有高铁上的这种随意。

规则意识是从小事做起的,不可能平时大大咧咧惯了,换个环境,就能展现出应有的素质来。身挡高铁的女子身上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子,从这个角度说,也许该反思的人不止合肥的这位女子。

## 医者说

# 2018年:该是“神药”走下“神坛”的时候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作兵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包治百病,适应症几乎包罗万象的神药,绝对不是一个好药。



2017年的年末,又一只儿科神药“匹多莫德”被扒了皮,原形毕露。该药几乎可以包治百病,“呼吸道感染、哮喘、泌尿系统感染、妇科感染、丙型肝炎、甚至是非感染性疾病如白癜风、肿瘤、过敏性紫癜”等病均有较好的预防或治疗效果。简直是万能神药!

这个强行干预小孩免疫力,扰乱小孩自然免疫平衡的神药,中国小孩的父母亲相信了,中国的某些医生相信了,居然药物监管部门也信了。据《一年狂卖40亿的匹多莫德,请放过中国儿童!》报道,“匹多莫德”这个神药,居然在国外还几乎处于临床前的动物试验阶段,而我们中国的很多小朋友提早享受了这个待遇。

药物不同于普通食物,药物的上市和适应症,必须有严格的一套流程。就以美国的一个新药上市来说吧,首先在实验室合成或者找到目标药物,然后进行动物药物毒性、不良反应、疗效评估,才可以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单。FDA批准进入漫长而又严格的临床试验阶段(Clinical Trials)。临床试验包括3个时期,一期是健康志愿者,主要测试药物毒性和代谢过程。二期是少量病人身上,测试药物对该疾病的疗效。三期是大规模的多中心的病人试验,观察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三期严格审查后,FDA才可能批准药厂批量生产。临床应用后,通常还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药物观察和不良事件上报(四期)。通常一个公司需要花费5亿美元资金,用12到15年的时间才能将一个新药从试验室走入市场。

一些跨国药企纷纷把药物的临床试验场地转向收费相对低廉的中国和印度。跨国制药企业愿意在中国开展试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相较欧美、日本等国,在中国试药成本较低;二是中国人口多,病源丰富;三是中国的药品市场庞大,早日试验有助于尽快获准在中国上市。但药品毕竟关系到国人健康权、知情权,涉及到伦理问题,不可不谨慎。

那么,一个国外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物,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年销售40亿的“神药”呢?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包治百病,适应症几乎包罗万象的神药,绝对不是一个好药。医疗界内部称这种药是“味精药”,所谓“味精药”就是没有明确疗效,但也不会有多大副作用,安慰剂而已,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病都不治,但什么病都能用”,是过度医疗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专家一针见血:一些“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高度可疑,却每年耗费大量的医保资金”。这些药物包括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蛇毒血凝酶、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脑蛋白水解物等,都是年销售额超十亿元的大品种。

中国有非常严格的新药审批和伦理监管制度,但这些几乎包治百病的“匹多莫德”类“味精”药物,是如何逃过我们审批部门的火眼金睛,又如何火爆市场,成为“神药”呢?值得深思。

(作者为浙医一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研究中心主任)

# “北归行动”是人与人的温暖支撑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北归行动”是一个社区文化相对成熟后,将其友善互助精神延伸至社区以外的表现。正因为这种公共精神的外溢,其又具有市民精神的特征。



这几天杭城气温骤降,在户外呆久了,让人瑟瑟发抖。不过昨天看到的一则新闻还是让人暖心:地铁2号线西北段二三期于近日开通,方便了良渚站周边的市民,但有的小区由于离地铁站较远,从小区到地铁口的交通接驳成了问题,为此良渚文化村的一些业主自发建立了互相约车的微信群,业主们可以临时搭乘途经地铁站的邻居的私家车。他们把这个互助行动叫作“北归行动”。

久闻良渚文化村的“村民文化”建设很好,邻里相助氛围浓厚,“北归行动”能够顺利发起并反响热烈,当与这种文明养成有关。据悉,参加行动的业主多达1000多人,多半是自愿搭乘邻居的车主。换言之,乐意帮助邻里的业主一不小心可能比求搭车的人多。在微信群里,有些人还为能够帮到邻居而感到兴奋不已。物业也给力,专门赶制了一批黄丝带,发给有需要的业主。

“北归行动”是一个社区文化相对成熟后,将其友善互助精神延伸至社区以外的表现。正因为这种公共精神的外溢,其又具有

市民精神的特征,往大了说,这还是城市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在市民文明这方面,杭州有不少方面确实走在了前面。比如机动车礼让行人,至今让外来游客赞不绝口。

这个事例还说明了两点:其一,只要条件适合,市民普遍具有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其二,由社会发起的类似公益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私家车车主本身每天要途经地铁站,顺便带上小区居民,既是举手之劳,又能感受到做好事的快乐,所以普遍会有参与热情。但从小区到地铁口公共交通不便(主要是等候时间问题),也表明公共交通设施还有待于跟进,存在一定滞后。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公交公司,而是想说,在这种时候,自发互助的效率往往更高。比如说等公交公司来调研,开通地铁公交专线,不免要有些时日。

类似事例还有不少。比如现在天气那么冷,那些在外面居无定所的流浪人员该怎么办?一种办法是政府救助机构及时部署救助措施,另一种办法是发动公益组织、社会团体

和市民参与其中。

不必讳言,后者往往比前者迅速,也更加到位。政府救助机构开辟避寒点,让流浪人员前往,又或者外出巡视,劝导护送流浪人员进站避寒,这就涉及到统一部署、安排协调等问题,而一旦有哪个环节脱节,比如社区人员没有落实到位、巡视路线和时间不全面,措施就跟不上了。如果发动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和市民参与其中,便可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就像夏天时,许多商家会主动提供免费冷饮,还有许多机构会开放冷气供人避暑,这就可以更为广泛地覆盖有需求的人群。比如图书馆、快餐店开放让流浪人员进入,这本身就发挥了避暑避寒点的功能。

一座城市的文明素质提高了,许多公共难题往往能够迎刃而解。因为这时候,每个人不再像一座孤岛,自求多福,而是人和人之间联结成为一片大陆,互帮互助。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说在公共服务不到位的时候,等待救助者不至于无依无靠。